

陸游

张
毅
著

诗歌传播、
阅读研究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2013M540179)

陆游

张毅 著

诗歌传播、
阅读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陆游诗歌传播、阅读研究/张毅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309-10440-0

I. 陆… II. 张… III. 陆游(1125~1210)-诗歌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7956 号



陆游诗歌传播、阅读研究

张毅 著

责任编辑/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 字数 191 千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440-0/I · 822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	---

上 编

第一章 传播的载体——选本研究	17
第一节 陆诗编选小史	17
一、宋末元初——陆诗编选的发端	17
二、元初到明末——陆诗编选的停滞期	21
三、明末到清乾隆十五年——陆诗编选的繁荣期	25
四、乾隆十五年到清末——陆诗编选的流变期	29
第二节 选本、选目、选例分析	32
一、选本的分类分析	32
二、选目的量化分析与编选的“马太效应”	37
三、陆诗选例分析	42
第三节 杨大鹤《剑南诗钞》述评	53
一、杨大鹤《剑南诗钞》的面貌和传播概述	53
二、历史上对杨大鹤《剑南诗钞》的批评	56
三、杨选本受欢迎的原因初探	63
第二章 阅读的主体——读者及读者的趣味	68
第一节 明中期以后的读者	68
一、读者的阶层	68
二、读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72

第二节 读者的趣味	75
一、明清绅士的趣味与陆诗的阅读	75
二、明清工艺美术风格与陆诗的欣赏	81
第三节 清代楹联与陆诗的阅读、欣赏	87
一、陆诗进入联语	87
二、陆诗联语举例分析	89
三、联语作者对陆诗的处理手段及其阅读效果	94
四、楹联的流行对陆诗阅读、欣赏的引导	98

下 编

第一章 书报出版与政治生活中的陆游	103
第一节 民族主义潮流中的陆游诗	103
一、反清革命思潮与南社	104
二、作为三民主义一支的民族主义	111
第二节 梁启超与《读陆放翁集》四首	116
一、“新民”说的实践	117
二、《读陆放翁集》四首的认同和传播	121
第三节 胡适和白话诗	126
一、白话诗的正当性	127
二、有意的借鉴和无意识的相似	132
三、陆诗传播、阅读、评价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变化	139
第四节 书报出版与陆游、陆诗	142
一、民国图书出版与陆诗传播	142
二、报刊文章与陆游形象	146
第二章 文学史写作与陆诗的阅读和评价	149
第一节 关于陆游、陆诗的一般知识	149
一、早期文学史的陆游经典评述	150
二、走向丰实:专体文学史和断代文学史中的陆游	153
三、文学史的成熟范例	158

第二节 文学史观念与“一般知识”的演变	163
一、爱国情感的培养和民族主义的观照	163
二、两种进化论——语言工具和文学体裁	166
三、写实主义在陆诗中的表现	170
 第三章 从民国诗话看陆诗和陆游	175
第一节 民国诗话中的陆游	175
一、淡泊、闲适的隐者,多产、寿考的诗人	175
二、作为“志士”的陆游	180
第二节 钱锺书《谈艺录》的陆游批评	184
一、《谈艺录》陆游批评的要点	186
二、《谈艺录》陆游批评的特点	188
三、《谈艺录》到底批评了谁	193
 结束语:历史画廊中的诗人面影	198
 参考文献	207
 后记	219

绪 论

一、以往的研究及其特点与当前的研究

明末以来,一股“陆游热”(具体说是“陆诗热”)一直没有消歇,这一潮流发展到清乾隆时,《御选唐宋诗醇》是一个大的成果,不但奠定了陆游、陆诗在古典诗歌领域的牢固地位,也规定了陆诗在社会主流艺术、教育、政治生活中的理想阅读视角和解读方式。此后,经过清、民国,直到新中国,陆游都始终是古典诗人中备受瞩目的一个。哪怕是宋诗整体遭到冷遇的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初期,陆游都以其“感激豪宕”的“爱国”、“民族”诗篇,在文学史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许多文学史著作中甚至成为南宋诗歌的典型代表。

整个 20 世纪都是陆诗阅读、传播、研究的繁荣时期。从研究角度讲,陆游作品的整理、注释,生平的梳理、考证,思想的总结、评述,以及陆诗艺术的批评、鉴赏,都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如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欧小牧、于北山的两种《陆游年谱》、胡怀琛、苏雪林等的陆游传记,专著如郭银田《陆放翁之思想及其艺术》,另有朱东润先生《陆游传》、《陆游选集》、《陆游研究》以传记、选集、专论相结合的全面、深刻的讨论,陈衍《石遗室诗话》、钱锺书《谈艺录》等诗话类著作中细致而扼要的评论,皆其尤为秀出者。要将陆诗研究推向进步,珍视这些成果,并尊重地、批判地对待它们是必要的。本世纪初,傅明善《近百年来陆游研究综述》(《中国韵文学刊》2001 年第 1 期)、叶帮义《二十世纪对陆游和杨万里诗歌研究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 年 9 月第 3 期),都是梳理、总结上世纪陆游、陆诗研究成果的工作,《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中《宋代文学研究》(张毅主

编,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十六章“陆游研究”,则汇总得更全面、梳理得更整齐些。

20 世纪的陆游研究,始终与“政治”(包括民族的政治命运、社会的政治氛围、国家的政治话语等等)密切相关,在今天看来,这是陆诗研究中几乎无须解释的特色。从 19 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中华民族危难时期,大体上也是中国学术研究向现代化转型的开始,政治与学术的潮流互相汇合、交融,产生了陆游、陆诗研究的第一批现代学术成果,同时也决定了这些成果以政治生活为怀、为社会需要服务的鲜明特色。从梁启超、柳亚子等人开始,对陆游的评价总是饱含现实关怀、甚至挟有政治宣传的意图。他们对陆游诗的评论,始终以“爱国”信念、民族思想、政治追求为基本点,此后的大量纯文学研究更继承这一传统,将其“发扬光大”。这种以政治信念为主要参照的批评和研究几乎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成为时至今日陆游研究的不变底色。如今,“爱国”已经成为关于陆诗的论文或文学史章节中的经典“判词”,似乎已经没有了讨论的余地和必要,因此,也使大部分研究者丧失了感受、欣赏陆游爱国诗作和讨论这一权威判词的兴趣。

陆诗研究可能是 20 世纪与政治纠缠最深、受政治困扰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题目之一,这其中包括社会环境、政治运动、政治需求、政治权力……因素的参与。进入新时期,以政治或阶级为第一标准的研究倾向得到反拨,回归文艺本身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但是,在“爱国”业已成为笼罩陆诗的强势表达之后,向作品或艺术“回归”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最简洁的方法通常是“绕路而行”,即在默认的前提下避开与陆诗的“爱国”相关的话题,而直接切入其他更有兴味的问题,比如陆游卒年和会见曾几时间的考辨,《钗头凤》词及《沈园》诸诗本事的挖掘,这些实证性研究可以有效地突破常识的蒙蔽而接近作品本身;又如对山水诗、梅花诗、记梦诗的研究,题材、意象的研究对把握艺术技巧、揭示创作心理也有一定的益处。这种看似直接、实则迂回的方式在陆诗研究模式的转换上起到过不小的作用,至少在“爱国”的大判断之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一些重要方面,而不仅仅停留在阶级属性的分析、政治思想的归纳和爱国诗篇的评价上。

但是默认或回避,却不能阻挡这一由来已久的倾向对今天陆诗研究继续发挥的影响。至今,“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仍然是有关陆游的文章、论文和文学史教材中千篇一律的开场白,即便是在文献整理、考证的作品中也少有例外,由此折射出这一常识观念的支配力量。这种影响以及今天我们对它的回避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前陆游研究的局面:

一方面,是陆诗中原来长期被视为重点的“感激豪宕”(或曰“爱国”)部分遭到了恭敬的冷遇。人们很少对它们提出批评或质疑,而是在各种各样的文章中近乎仪式性或习惯性地给予承认。在这毫无保留的承认里,多少隐藏着这样的危机:许多读者和研究者可能无法从这些“爱国”诗中获得真正关于“爱国”的感召,它们有可能已经孤悬于封闭的政治、常识的话语空间里,既受不到威胁,也引不起回应。仪式性的承认恰好充当了当前研究兴趣与以往接受重点之间的“隔离带”,使“爱国诗”成了读者阅读实践和审美经验触及不到的区域——清末、民国以来对“爱国”的过度赞誉,几乎“捧杀”了陆游。

另一方面,是当许多研究者绕过陆诗中占很大比重的爱国之作,而把目光投向山水、纪梦、咏物等等名目时,陆诗的研究呈现出题目零散、缺乏焦点的状态。检索“中国期刊网”,2000—2007年间关于陆游、陆诗的论文,总数在二百到三百篇,平均每年几十篇,也算颇为可观的数量了。其中,论陆诗题材、特色者有之,考陆游交游、行迹者有之,写陆游医术、书法、养生、教子者亦有之,陆游与梅花、陆游与海棠、陆游与茶、陆游与沈园、夔州、三峡……题目不一而足。这说明,“新时期”以来的陆诗研究正在走出旧有话语的笼罩,开拓出日益广阔的研究空间,使陆诗中许多过去不为人重视的篇章和特点显现出来。研究者们也在努力采取各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历史学的、民俗学的、心理学的、解释学的……贡献了很多新颖的题目,如陆诗“效果史”的研究,陆诗中的“商贾精神”,陆游的“巴蜀情结”、“生命意识”,使陆游研究呈现出异常绚烂的景象。这些值得尊敬的工作,当然也为本书的撰写带来了不少启发。但是,从陆诗研究的全局看,随着“爱国”作为一个虚设的核心和重点逐渐淡出视野,并没有形成关于陆诗的新的核心问题和观照重点,陆诗的研究者们基本上各在一隅,

他们的研究呈现出各说各话、自说自话的局面；同时，他们的成果也大多分散零碎，缺少有代表性的优秀之作，能够影响陆游、陆诗整体认识的研究更是几乎没有。庞大可观的数量与不太高的质量和分散无规则、无重点的成果，不免使当前的陆诗研究呈现出一种“热闹的冷清”，而当我们重新仰望陆游，觉得现在的陆游，依然线条简单、形象高大、充满崇高气息，和一百年前十分相似。

二、对于陆诗和以往研究的提问

20 世纪对陆诗的研究是比较彻底、全面的，但还有些基本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需要、也可以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举例来讲，陆游的近万首诗作，自《御选唐宋诗醇》以来，一直被“一分为二”，取其“感激悲愤，爱国忧君之诚”，而“略其纤巧可喜之词”。此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这个分法，就是“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与“流连光景”两类；前者代表陆游爱君忧国的一面，后者则多指描写闲适生活的内容。对陆诗的这种分类法，一直通过民国延续到现在，是文学史类著作的常见模式。与此对应的，是陆诗豪放雄浑、悲壮沉郁与细腻圆润、尖新刻露两种风格的概括。现代关于陆诗的知识是建立在这种两分基础之上的。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二者的关系。从清代开始，前者总是受到公开表彰，而后者则时常显得无关紧要、光华黯淡，依附于前者，甚至被视为与前者对立而遭到排斥，如纪昀《瀛奎律髓刊误》说：“此种诗是放翁不可磨处。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如全集皆‘石研不容留宿墨，瓦瓶随意插新花’句，则放翁不足重矣。何选放翁诗者，所取乃在彼也？”（案：见评卷三十二忠愤类《书愤》“镜里流年两鬓残”）^①。他所举对立的两诗，正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内容、风格的缩影。在陆诗中，爱君忧国居主、流连光景居次，前者高、后者低的观点，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到潘德舆、梁章钜、李慈铭等都持此说，而这种对二者主次、高低、取舍、抑扬的基本倾向，也为民国乃至当代的研究者所认同和继承。这种认识也是我们今天把陆游称为“爱

^①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372 页。

国诗人”的潜在依据。但是,由这个现象至少可以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两种内容、风格相异甚至“相悖”的作品,是如何统一在一个诗人陆游的人生和创作之中的呢?一般的解释方法,是使一者附属于另一者,如《御选唐宋诗醇》对一部分“温柔敦厚”的作品则称“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为咏歌,以寄其意”,而更多的“纤巧可喜”之词则删略了;胡云翼则说:“这种‘作得闲人要十分’的骨子里,便是‘用世’的反动行为。原来陆游实在是一个‘空怀救国心’的志士,怀抱莫展,只得浪游啸傲终身,而‘故作闲人样’了。”^①把陆游山水、田园、闲适诸作说成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把闲适、闲居、遣兴说成怀才不遇的排解,后来就成了司空见惯的套路。连谈论陆游不幸的婚姻时,也常常推想唐氏有支持抗战北伐的政治立场,认为这影响了陆游的仕途而导致婆媳关系的破裂,可见,陆游的一生和陆游的作品在读者眼中濡染政治色彩之深。但是,真的可以认为曾经感染了读者数个世纪、以至于给陆游带来“老清客”名声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绕庭数竹饶新笋,解带量松长旧围”、“瓶花力尽无风堕,炉火灰深到晓温”诸作,都是政治关怀的“曲折表达”,是苦闷心情的宣泄,都充满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微言大义”么?陆游大量闲适、优美的作品,究竟如何与那些爱国、悲壮的作品合理并置,才能使读者看到一个完整、浑成而又不简单、平面的陆游呢?

第二,被认为是陆诗主要成就的爱国诸作,那些最具社会关怀和“教育意义”、立场鲜明、风格豪放的作品,在历史上曾经遭到许多怀疑和批判,有人认为这些诗作是为迎合皇帝北伐的意愿而作^②,或是书生说大话、以爱国、复仇为作诗由头^③,对它们的豪放风格,贺裳说

① 胡云翼:《宋诗研究》,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47页。

② 叶邵翁:《四朝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参见卷二“陆放翁”：“人谓公探孝宗恢复之志，故作为歌诗，以恢复自期。”

③ 赵翼:《陔北诗话》，见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版，卷六：“其时朝廷之上，无不以画疆守盟、息事宁人为上策；而放翁独以复仇雪耻，长篇短咏，寓其悲愤。或疑书生习气，好为大言，借以为作诗地；今阅全集，始知非尽虚矫之气也。”

“时为激昂磊落之言，颇有衽衡跼地前来，嵇康扬鎚不辍之态”^①，也是很漫画化的概括。直到民国时期，胡怀琛、钱锺书等一批陆诗研究、批评方面很有成就的学者，对陆游的豪放、爱国之作还都持非常有限的认同，甚至抱怀疑态度^②，鲁迅先生也曾批评过陆诗“豪语的折扣”^③。但这些批评和质疑，很少得到慎重的对待，文学研究者们大多视之为“主和派”小人对英雄志士的诬蔑，或是一般读者的误会，或是“政治觉悟”、欣赏水平不够高，或是研究者的“时代局限性”，总之是努力为陆游辩护，理所当然地把爱国、豪宕之作定为陆诗的“主要成就”。但是，只要稍微仔细地汇总材料，就可以发现质疑和批评的数量之多、存在之广，真的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吗？历经清代、民国、新中国成立初、新时期社会环境、读者视野的变迁，陆游爱国尚武、豪迈悲壮的作品为什么能始终与现存的权力秩序、主流意识达成和解、保持一致，那陆诗所谓的“批判力量”又何在呢？不但《御选唐宋诗醇》对他赞赏有加，民国间各种“民族文学史”、“抗战文学史”里陆游也是大角色，就是在新中国成立最初二三十年的特殊环境下，整个宋诗研究处于萧条时代，但陆诗仍以其爱国特色受到礼遇。而对陆游爱国诗的创作背景，赵翼说：

“时当南渡之后，和议已成，庙堂之上，方苟幸无事，讳言用兵，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于是以一筹莫展之身，存一饭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虽神州陆沉之感，已非时事所急，而人终莫敢议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声疾呼，或长言永叹，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④

① 贺裳：《载酒园诗话》，见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卷一“末流之变”。

② 胡怀琛：《中国八大诗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初版，参见第88页：“以上各首都是他激烈豪宕的诗，这也是放翁诗的一种特色，我以为其意固然可去，然终未免书生说大话罢”。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第132页“放翁二痴事二官腔”：“放翁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舍临歿二十八字，无多佳什。”

③ 鲁迅：《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42—244页。

④ 赵翼：《瓯北诗话》卷六。

赵氏无意中道出一个事实：陆游激切愤慨的政治抒情诗，在产生的当时就拥有天然的正确性：它们虽然激愤，虽然批评政治，但这种“处士横议”却不会给议者带来祸患。它们尊重现存秩序的大前提，而希望改进它，要求为它效力，所以尽管出言激烈，但“人莫敢议其非”。“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承担较小的政治风险，而可以取得极大的艺术效果。这种作品虽然以批判的面貌出现，却符合社会的“主旋律”，故而钱锺书先生称之为“官腔”。因此，陆游的“爱国”之作，还要区别对待，比如钱先生指出的“临没二八字”，就与很多书生说大话或功名之念多于爱国之思的作品不同，陆游“爱国诗”的价值，也似需要重新考量，毕竟文学的重要价值，不在于巩固现存的权力秩序，而在于提供超脱于一己利害之外的净化可能和破除常识惰性，带来心灵自由和反思能力，这样看来，陆游连篇累牍的“爱国”诗篇，难道不需要适度的质疑或警惕吗？

第三，尽管“感激豪宕”的成分始终被视为陆诗主流和真正价值所寄，但欣赏“流连光景”之什的读者代不乏人。对陆诗进行两分，并将二者分出高下，这行为本身就说明另一种阅读实践的存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陆诗选家“后人选其诗者，又略其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之作，惟取其流连光景，可以剽窃移掇者，转相贩鬻”。类似的批评在此后两百多年间一再重复出现，如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亦斥其“圆密稳顺，一时可喜”之句，而标举“忠愤所结，志至气从”之作^①。《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香菱道“我只爱陆放翁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切有趣”，林黛玉却告诫“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这些批评本身，也反映出读者中对陆诗中细腻圆妥之作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态度。“重帘不卷”固然纤巧单薄，又容易耽溺，但像林妹妹那样“知诗”的读者毕竟总是少数，香菱却代表读者的主流。《红楼梦》第十七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宝玉作的“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也是两联陆放翁式的句子，正属于“流连光景”

^①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四、卷五，《清诗话续编》（下册）。

的那一类。此类作品曾占有如此广大而真实的市场,读者欣赏其细腻、优美,喜爱其“真切有趣”,并不在意其中是否包含了人生际遇的感喟或关涉现实政治的微言大义。但是,近代以来,这一阅读倾向始终遭遇忽视或贬低,陆诗的阅读史常常被视为其“爱国”内容逐渐彰显的进步过程,而对“流连光景”诸作的喜好则时常面临成为有闲阶级、无聊文人、清客相公的“低级趣味”的危险。这是近代以来的特殊社会环境决定的,同时也继承了《御选唐宋诗醇》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的主流观点。对这一类作品如何评价?它们与爱国诸作的关系如何?它们所包含的不关风教、不寓劝惩的趣味在读者中曾经引起怎样的共鸣?历史上的陆诗进入读者精神生活的实况如何?

解答上述问题,可能有助于建立更全面、亲切的陆游形象,探索历史上读者对陆诗的阅读趣味,也有助于更准确地估计陆游“流连光景”之作的价值。同时,把一个什么样的陆游和陆诗带给今天的读者,也是文学研究者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今天对陆游和陆诗的理解,不仅来自对作品本身的直接体会,更基于数百年积淀下来的阅读经验。而研究陆诗的传播、阅读过程,梳理近百年来陆诗研究的历史,尤其是直面陆诗与政治生活的关系,都将有助于批判地反思数百年来来的阅读经验,并为上述问题提供解答。

三、研究的途径与本书的结构

除为现实服务、为苦难和弱者呼吁之外,艺术有其更深远、普泛的价值,它能使欣赏者超越一己利害和功利目的,达到心灵净化的作用。诗歌使读者站在现实立场、现存权力和习惯之外进行反思。通过净化、反思,读者可以突破一般道德信条、常识观念的惰性与束缚,走向更深广的自由,获得精神开放、卓越的可能。惟其如此,对政治生活的激情观照,才不至于蜕变为歌功颂德或粉饰太平的浮词套话。陆游的诗歌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能够打动几百年间的众多读者,自有真正的动人之处,或是对“国”、对“群”的牺牲奉献突破了小我生命的狭窄,或是英雄梦想超越了平凡人生的局限,或是优美、充实的情趣实现了日常生活的空灵化、审美化……总之,借助阅读,读者可以获得人生的扩充与精神的自由。所以,读者对作品的喜爱是来不得

虚假的,读者欣赏与国家教化或诗坛宗主的号召、催眠是两码事,其中就蕴藏着诗的价值。笔者对陆游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理解。

本书的讨论虽然还远不能触及艺术最终的、普泛的价值,但仍悬此价值为遥远的准的。所以,本文的重点,不在陆诗的“爱国”及其“爱”的程度、方式、表现等等,不在陆诗的技巧及其分类、运用等等,不在陆诗的背景及其本事、考证等等,而在于它对读者的价值的实现,在于其价值实现的过程、方式,在于陆诗的传播、阅读、遴选、评价等一系列读者实现作品价值的活动。

这一研究从接受美学理论中获得了重要的启发。接受美学将“审美经验”放置在人类艺术实践的显著位置,成为艺术与人之间的中介,正是通过历史的审美经验,文学作品得以在种种不同的环境、时代中获得具体的展开。

要衡量一个作品的价值,审美经验显然是重要的标准。上世纪60—70年代,耀斯提出“作为文学史的挑战”的“接受史”理论时,他针对的是纯文本主义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将作品引向封闭,重视作品的内在语言结构而脱离历史的解释。因此,康斯坦茨学园的研究者们适时地继承了黑格尔、马克思以来许多先驱的注重历史理解的传统,将文学研究从封闭的语言学视野引向开放的历史视野。从此,文学史的研究不再是单纯的文本结构的研究,而主要是作品在历史中的效果,即文本在历史的读者阅读实践中的具体化过程,也是读者接受和解释作品的过程,借此勾勒出艺术理解的历史经验。这种努力无疑将有助于接近文艺作品的“普泛价值”,但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学会封闭、内向地看待作品也不过是那个世纪最后十来年的事情,而对“历史性”理解的了解和把握,不管是真是假,在中国早已经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广远了。因此,我们获得的启发不仅仅在于文学作品理解和解释“历史性”,诸如集注、汇评之类形式所包含的解释学性质的成分,更在于这一理论所包含的对读者审美实践的重视以及“审美经验的历史性”,或者说“历史审美经验”。

对审视和梳理曾经与社会史、政治话语、意识形态、庸俗社会学观点深深纠缠了近百年的陆游研究以及八百年来的陆诗阅读活动来说,接受美学无疑指出了一条便捷通路。“在接受美学看来,艺术经

验使人摆脱了具有控制关系的历史,使人的行为具有价值的独立自主性……艺术经验具有难以驯服、难以驾驭的性格。正是借助于艺术经验,人才得以拒绝意识形态对世界的解释,而坚持自己的解释。”^①清理和描述艺术经验的历史,将使我们有可能从新的角度看待研究、教学和大众传媒领域对陆游诗歌的经典描述,尤其是揭示这套描述话语与读者切身的审美经验之间的显著分歧。

并且,耀斯在《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中对“审美认同”的层次界定以及其互动模式的说明,很有助于具体地理解陆诗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接受情形^②,其细腻的分析也可以引导我们对陆诗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的审美经验发生更深刻的兴趣,并获得更具深度和层次感的体会,而这将非常有助于廓清历史上陆诗研究的混乱,获得对其历史的艺术理解及其一般艺术价值的更清晰的认识。

本书的具体设计,依照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编。上下编之间以清末为时间界限,其政治和社会背景是甲午战败和戊戌变法,其在文学上的表现是梁启超《读陆放翁集》四首的写作(1899年)、发表(1902年)和南社的成立。以这一时间为分界点,陆诗的传播与接受分为性质不尽相同的两大阶段:陆游身后到清末的七百年和清末以来的一百年。前七百年和后一百年,陆诗的阅读、接受伴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塑造了我们今天面临的关于陆游、陆诗的文化景观。在这两个时段中,前段的叙述重点在末三百年,即明末到清末,这既是因为陆诗传播的繁荣期开始于明末,从此有了此前三四百年没有出现过的、丰富的陆诗阅读、接受现象,也是因为下编所涉及的清末、民国读者所面对的已经成熟的陆诗阅读习惯、阅读经验、批评传统主要积淀并定型于此时期;下编的一百年,叙述的重点在前五十年,即1949年之前,因为这是梁启超、胡适等一批风云人物的影响力覆盖整个文化领域而引起陆诗阅读、评价急剧变化的时期,也是清末陆游形象发生变动并重新定型的时期。

① 刘小枫:《接受美学的真实意图——〈接受美学文选〉编后》,《读书》,1987年1月。

② 参见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版,第187—223页。

因此,本书的论述重点是向着清末这个时间点聚合的,也就是说,瞩目于以此点为轴心发生在陆诗阅读、批评中的一系列变化。

上编分为“传播载体”的研究与“阅读主体”的研究,前者研究陆诗的选本,后者研究读者的趣味。

陆诗九千余首的庞大规模决定了“选本”在陆诗传播中的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历史上的一般读者甚少接触《剑南诗稿》全集,而流行的选集就一方面体现了读者的趣味和抉择,另一方面又塑造着读者的趣味和阅读习惯,成为读者认识陆诗的有趣中介:既以其轻捷、廉价推动了陆诗的传播和流行,也以其简单、片面与可选择性重塑甚至歪曲着陆游的本来面目。“选政”作为一个“开放”的领域,在清代既受到帝王皇家、诗文宗主的重视,也接纳文人名士、书坊商人的参与,不同的选本反映出不同的阅读兴趣和评论主张。而读者的购买又可以通过供求控制选本的产生、流传、复制和消亡,从选本的流传、销售状况又可多少窥见普通大众读者的兴趣和品位。“选本的研究”一章通过陆诗编选小史、选本、选目、选例的总体分析,以及杨大鹤选本的个案分析等,试图揭示一部分陆诗传播的规律和特点,从中也可以看出皇家选本、宗主选本与名士选本、坊选本在阅读、批评主张上的区别及其流传的不同效果。

“读者趣味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明清读者欣赏陆诗的真正重点和方式。为了使“读者”的生活习惯、文化修养、心理素质、审美倾向获得较为具体、现实的基础,将其主体定位为明清发育起来的“士绅”阶层,以使读者趣味的讨论更加具有针对性。读者阅读活动的讨论,以“趣味”为关键,而回避过去研究中经常引述的大量主要来自传世诗话、文集的批评“言论”,因为,在笔者看来,体现在书法、绘画、楹联、小说中的陆诗批评,是读者审美趣味不自觉、无意识的流露,其中所包含的有价值的信息并不比身受正统教育的士大夫的自觉言论中少,而且可能有其更加真实、生动的一面。当然,回避诗话等传统材料的结果,是必须引入书法、楹联、小说等其他材料,并须以同时代的工艺美术为参照来互相发明,这可能使一些观点有偏颇和不周密之处。但笔者依然相信这一方式在一定程度内的可行性。

下编分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文学史著作、诗话中的陆游三章,主